

杨伯峻

论语译注

(典藏版)

中华书局

杨伯峻 译注

论语译注

(典藏版)

中华书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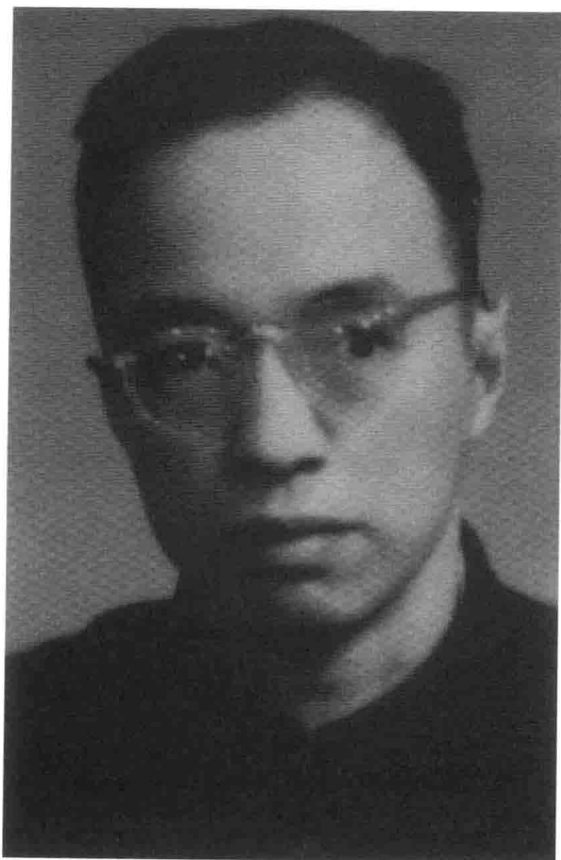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译注:典藏版/杨伯峻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6
ISBN 978-7-101-10778-4

I. 论… II. 杨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-译文③《论语》-注释 IV. B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9565 号

-
- 书 名 论语译注(典藏版)
译 注 者 杨伯峻
责任编辑 徐真真 张继海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14 $\frac{1}{8}$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
- 印 数 1-10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778-4
定 价 39.00 元
-



杨伯峻 (1909~1992)



杨伯峻先生晚年生活照

論語譯注

楊伯峻著

1958年单行本第一版



1980年单行本第二版

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



論語譯注

楊伯峻譯注

中華書局

1990年代“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”版

试论孔子

孔子身世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（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，即公元前551年），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相差仅一年。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，实在不必。死于鲁哀公十六年，即公元前479年。终年实七十二岁。

孔子自己说“而丘也，殷人也”（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），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。周武王灭了殷商，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。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，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，便改为孔氏。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（见《左传》桓公元年和二年）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《索隐》，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，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纥，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，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。

殷商是奴隶社会，《礼记·表記》说：“殷人尚神”，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。孔子也说：“殷礼，吾能言之。”

（3·9）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、新兴封建制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。孔子本人，便看到这些迹象。譬如《微子篇》

(18·6) 耦耕的长沮、桀溺，不但知道孔子，讥讽孔子，而且知道子路是“鲁孔丘之徒”。这种农民，有文化，通风气，有自己的思想，绝对不是农业奴隶。在孔子生前，鲁宣公十五年，即公元前594年，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制。即依各人所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，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。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说：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。天下的土地全是天子的土地，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、亲戚、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，或者成为国家，或者成为采邑。土地的收入，大部为被封者所享有，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。土地的所有权，在天子权力强大时，还是为天子所有。他可以收回，可以另行给予别人。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，如汉代初年，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。在汉代以后，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，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。而在奴隶社会，从事农业的基本上是奴隶，土地既是“王土”，当然不得自由买卖。鲁国的“初税亩”，至少打破了“莫非王土”的传统，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，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。一部《春秋左传》和其他春秋史料，虽然不曾明显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，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。已经有自耕农，长沮、桀溺便是。《左传》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（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），申鲜虞“仆赁于野”，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“隐民多取食焉”，隐民就是游民。游民来自各方，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。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，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。春秋时，商业很发

达，商人有时参与政治。《左传》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。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，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犒劳秦军，示意郑国早有准备。昭公十六年，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，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出卖玉环。到春秋晚期，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，一面做买卖。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，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，大发其财。这些现象应该能说明两点：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，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，尤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。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。于是乎又可以说明，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，兼并现象也发生了，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，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，经营田地和农产品。

至于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这一传统，更容易被打破。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以后，王仅仅享有虚名，因之一般士大夫，不仅不是“王臣”，而且各有其主。春秋初期，齐国内乱，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。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，鲍叔牙则是小白（齐桓公）之臣。小白得胜，召忽因之而死，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。晋献公死后，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，但另外很多人，却分别为公子重耳（晋文公）、公子夷吾（晋惠公）之臣。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，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为晋国所用的情事。即以孔子而言，从来不曾做过“王臣”。他从很卑微的小吏，如“委吏”（仓库管理员），如“乘田”（主持畜牧者——俱见《孟子·万

章下》），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，才进入“大夫”的行列。鲁国不用他，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“无道”的卫灵公。甚至晋国范氏、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（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），来叫孔子去，孔子也打算去。（17·7）这些事例，说明所谓“莫非王土”“莫非王臣”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形势的变迁，被人轻视，甚至完全抛弃了。

孔子所处的社会，是动荡的社会；所处的时代，是变革的时代。公元前546年，即孔子出生后五六年，晋、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。自此以后，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少了，而各国内部，尤其是大国内部，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，却多起来了。鲁国呢，三大氏族（季氏、孟氏、仲氏）互相兼并现象不严重，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，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，死在晋国边邑乾侯，鲁哀公出亡在越国，死在越国。

这种动荡和变革，我认为是由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。根据《左传》，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，即鲁襄公十年，鲁国三大家族便曾“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”。这就是把鲁君的“三郊三遂”（《尚书·费誓》）的军赋所出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，三家各有其一，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，各帅一军。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。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，所分得的人口全部解放为自由民。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，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。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。过了二十五年，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，分为四份，季氏得一半，孟氏和叔孙氏各得四分之一，都废除奴隶制。这正是孔子所耳闻目见

的国家的大变化。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，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。当时还谈不上“百家争鸣”，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。孔子作为救世者，也有他的主张。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“异端”，还说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（2·16）

孔子的志向很大，要做到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。（5·26）在鲁国行不通，到齐国也碰壁，到陈蔡等小国，更不必说了。在卫国，被卫灵公供养，住了较长时间，晚年终于回到鲁国。大半辈子精力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。他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。

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

孔子的世界观，留在下面再谈。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即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渊源。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，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、经历、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，这就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。

第一，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，但早已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。他自己说：“吾少也贱。”足以说明他的身世。他父亲，《史记》称做叔梁纥，这是字和名的合称，春秋以前有这种称法，字在前，名在后。“叔梁”是字，“纥”是名。《左传》称做邾（zōu）人纥（襄公十年），这是官和名的合称。春秋时代一些国家，习惯把一些地方长官叫“人”，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邾地的宰（即长官），所以叫他做邾人纥。邾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

死去，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。相传寡母名征在。寡母抚养孔子，孔子也得赡养寡母，因之，他不能不干些杂活。他自己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（9·6）鄙事就是杂活。委吏、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“鄙事”。由此可以说，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，到他自己，相隔太久了，失去了贵族的地位。他做委吏也好，做乘田也好，干其他“鄙事”也好，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。那些人自然都贫贱。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，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？孔子也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？这是不可能的。

第二，孔子是鲁国人。在孔子生前，鲁国政权已在季、孟、仲孙三家之手，而季氏权柄势力又最大。以季氏而论，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。当奴隶制度衰落时，他分得“公室”三分之一，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；到昭公五年，再“四分公室”，其他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，全都采用封建军赋制度。这是他的进步处。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，到三十二年死在乾侯，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，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，因为政权早已不在鲁昭公手里。但季氏，即叫季孙意如的，却一点也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，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国；鲁昭公死了，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。这不能说是倒退的，也不能说是奇怪的，自然有它的原由。第一，正是这个时候，齐国的陈氏（《史记》作田氏）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，鲁昭公三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种预言，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。然而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，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先例。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，齐、秦、晋、楚这些强

大之国，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？第二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后代的国家，当时还有人说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年）还说：鲁“犹秉周礼”（闵公元年）。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，现在流传的《周礼》不足为凭。但周公姬旦制作它，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，是可以肯定的。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不小力量，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。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态度，是目见耳闻的，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。是孔子没有评论呢？还是没有传下来呢？弄不清楚。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，即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，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即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。当时的鲁国，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，既有改革，而改革又不彻底，这种情况，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。

第三，孔子自己说“信而好古”。（7·1）他的学生子贡说他老师“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（19·22）孔子自己又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：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（7·22）可见孔子的学习，不但读书，而且还在于观察别人，尤其在“每事问”。（3·15）即以古代文献而论，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。他能讲夏代的礼，更能讲述殷代的礼，却因为缺乏文献，无法证实，以至于感叹言之。（3·9）那么，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。由《论语》一书来考察，他整理过《诗经》的《雅》和《颂》，（9·15）命令儿子学《诗》学礼。（16·3）自己又说：“五十以学《易》。”

（7·17）《易》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，而孔子不用来占筮，却

当作人生哲理书读，因此才说：“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他引用《易》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二句，结论是“不占而已矣”。（13·22）他征引过《尚书》。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。举一个例子，他的思想核心是仁。他曾为仁作一定义“克己复礼”。（12·1）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，根据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的话，在古代一种“志”书中，早有“克己复礼，仁也”的话。那么，孔子答对颜回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不过是孔子的“古为今用”罢了。孔子对他儿子伯鱼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（16·13）这本是孟僖子的话，见于《左传》昭公七年。孟僖子说这话时，孔子还不过十七八岁，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。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，吸取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，加以利用。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小影响。

第四，古人，尤其春秋时人，有各种政治家、思想家，自然有进步的，有改良主义的，也有保守和倒退的。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，有的作好评，有的作恶评，有的不加评论。由这些地方，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，反过来也可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。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，又是郑国最有名、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。孔子对他极为赞扬。郑国有个“乡校”，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那里议论朝廷政治，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。子产不肯，并且说：“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？”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，而后来评论说：“以是观之，人谓子产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”（《左